

到知識之路叢書

達爾文傳及其學說

海爾博著 李季譯

WEGE ZUM WISSEN
DARWIN

Sein Leben und seine Lehre
von Dr. Adolf Heilborn
übersetzt von Li Chi

亞東圖書館印行

版權所有

達爾文傳及其學說

實價國幣四角

著者 海 爾 博

譯者 李 季

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上海虞洽卿路四七五弄六號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再版

序言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上帝稱光爲晝，稱暗爲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

『上帝說，諸水之間要有空氣，將水分爲上下。上帝就造出空氣，將空氣以下的水，空氣以上的水分開了，事就這樣成了。上帝稱空氣爲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上帝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使旱地露出來，事就這樣成了。上帝稱旱地爲地，稱水的聚處爲海，上帝看着是好的。上帝

說，地要發生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着核，事就這樣成了。於是地發生了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各從其類，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着核，上帝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上帝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並要發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這樣成了。於是上帝造了兩個大光，大的管晝，小的管夜，又造衆星，就把這些光擺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晝夜，分別明暗，上帝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

『上帝說，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鳥飛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上帝就造出大魚，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

動物，各從其類，又造出各樣飛鳥，各從其類。上帝看着是好的。上帝就賜福給這一切，說：滋生繁多，充滿海中的水。雀鳥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

『上帝說地要生出活物來，各從其類，牲畜，昆蟲，野獸，各從其類，事就這樣成了。於是上帝造出野獸，各從其類，牲畜各從其類，地上一切昆蟲，各從其類，上帝看着是好的。上帝說，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像，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上帝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衆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上

帝說，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見舊約全書，創世

記中文譯本一至二頁。）

這上面的六段話雖係紀元前一千四百八〇年代希伯來人的神話，却是根據當時的生物進化觀作成的，即由植物進到動物，再詳細些說，即由草而木，而魚，鳥，蟲，獸，最後才是人。不過這種生物進化觀一經改作神話，視為教條，便一脈相傳，固定不變了。這樣的神話一直到十八世紀的歐洲，不獨在宗教上具有絕對的威權，即在科學界中也無不如此。凡對聖經懷疑的，那不僅是中國從前所謂「非聖無法」，簡直是「欺神滅道」，簡直是一種罪惡。就是一班有能力的大學者，也深信不疑。例

如瑞典的世界大博物學家林內 (Karl von Linné 1707—1778) 即認動植物的種類，從上帝最初創造時起，從未發生變化，也沒有增減。

後來殘酷的事實逼迫得一般有觀察力和思考力的學者不能熟視無覩，或學而不思，於是歐洲有文化的三大國家的學者都於同時有所察覺：即英國的醫生伊拉斯莫斯 (Erasmus Darwin) 法國的生物學家聖喜列 (Etienne Geoffroy Saint-Hilaire) 和德國的詩人哥德 (Johann Wolfgang Goethe) 都於一七九四至一七九五年間發生物變化的見解。尤其是法國的拉馬克 (Jean Baptiste Antoine Pierre Monet de Lamarck) 於一八〇九年刊佈他的動物哲學 (Philosophie zoologique) 舉出種種事實，說明動物種屬的變化。然與拉氏同時的屈費兒 (Georges Cuvier) 雖精研化石，知道古代的動物

與現代的不同，但他不認這是生物演進的結果，而是天翻地覆的崩潰的結果，即每一次大崩潰之後，從前的動物都死完了，上帝再創造一些新的出來，所以無論如何，動物的種屬始終是不變的。這一說在當時非常得勢力。

大家要知道以上所舉的一切情形，才容易了解，達爾文在世界遊歷中發見物種變化的事實，爲什麼回國後在許多年中秘而不宣，而物種原始出版後爲什麼又遇着各國學術界猛烈的反對。赫克爾（Ernst Haeckel）告訴我們說：

『就是科學中一班最著名的人物，也爲數千年來神話的傳說所囿，和有權威者虛偽的光華所炫，竟不視演進說爲自然科學最大的勝利，而視爲危險的退步；特別是評此說的生物』

學部分，即由來說，還不及理解力健全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平

常人的正確。』（見赫氏自然創造史序言六頁——*Natürliche Schöpfungsgeschichte*, Berlin und Leipzig 1923.）

然真理是不會因反對者的反對和有權威者的壓迫而歸於消滅的，豈止不歸於消滅，牠經過種種奮鬥，必獲得最後的勝利。凡從奮鬥中出來的真理被人們的認識必定深刻，受人們的擁護必定熱烈，而牠的影響也必定極為遠大。達爾文主義在西洋學術界中的情形正是如此。自牠出現並獲得勝利之後，便在自然史上劃了一個新紀元，而達爾文則和窩雷斯（*Alfred Russel Wallace*）所說的「一樣」是自然史上的「牛頓」了。

但達爾文主義一入中國，却没有表現牠在西洋所發生的那樣重

大的意義。這至少有兩種原因。

(一) 中國古代的哲人幾乎一律承認萬物的變化，絕沒有摩西 (Moses) 創造史上上帝創造萬物這一類的說法。尤其是莊子至樂篇明白說出物種的演進，就是：

『種有幾，得水則爲蠡，得水土之際，則爲黿蠃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螻蟴。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鵽掇。鵽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齔輅生乎食醯。黃輅生乎九猷。蒼莨生乎腐蠹。羊奚比乎不羣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這種說法雖與生物演進的事實不符，但至少沒有希伯來人上帝分離創造萬物的胡說，成爲後代學術思想的桎梏。

中國古代人不獨具有生物演進的觀念，並且早就打破了西洋至十九世紀猶迷漫思想界的『人類中心的迷信』。例如列子說符篇說：『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蟻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哉？』』

(二)中國本是一個開化最早的國家，故從前的學術思想也比西

洋進步，但後來因產業停滯，生物學即未嘗呈出發展的趨勢。迨達爾文主義於清末輸入，當時的學者一方面因其與我國古代的進化觀念相似，視爲平淡無奇，另一方面對牠的了解又非常淺薄。大家心目中所謂達爾文主義就只有『生存競爭』四個大字。贊成的人僅以『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一類的話相號召，而反對的人則以爲『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說不過真理的半面，而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是真理的另一半面，須二者聯合，才得其全。』這是清末的情形。當時關於達爾文主義的書，只有嚴復譯的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 的天演論 (Evolution and Ethics)，怪不得人們對於牠只有一知半解。

直至民國九年，馬君武先生才將達爾文的物種原始譯成中文（中華書局出版）距原著出版已經六十年了。再過十年，他又將達氏

的人類由來（按譯本名人類原始及類擇，商務印書館出版）譯出，旋且草一小冊子，名達爾文（萬有文庫本），於是宣言『予介紹達爾文於中國之工作，或竟止於此矣。』（見達爾文序二頁）關於達氏本人著作及傳記的書，就目前而論，雖只有此數，然講生物學的書，各書店已有大批譯本出現（亞東圖書館出版的進化論講話最便初學），國內學者對於達爾文主義的認識現在應當較從前深刻多了。

可是達爾文的著作在國內銷行雖廣（據馬君武在達爾文的小冊子中宣言，至民國十九年年初爲止，物種原始銷行已近一萬冊），學術界中對於他的學說不獨沒有表現，西方各國那樣熱烈的討論，並且始終還沒有什麼討論。這種現象告訴我們的是什麼？就是達爾文主義在中國還沒有發生深刻的影響。

這固然是一種可悲的現象，然還不是最壞的。『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淮北則爲枳。』達爾文主義一入中國，簡直和橘生淮北一樣。怎樣見得呢？胡適之先生說：

『達爾文的生物演化學說給了我們一個大教訓：就是教我們明瞭生物進化，無論是自然的演變，或是人爲的選擇，都由

於一點一滴的變異。……』（見胡適文選序言三頁）

這種說法將達爾文主義毀滅了一半，因爲達氏根據幾十年的實際考察與實驗，說明生物的演進，有漸變，也有突變，而胡先生代表垂死的資產階級的意識，最怕突變（即革命）的聲音傳入耳鼓，所以不管達氏著作的內容怎樣乾乾脆脆地以意度之，替他否認突變的事實，使他的主義表現一個滑稽像。（關於達爾文所舉的突變的事實，可參看拙著我的生平第二

冊四二六至四三二頁，亞東圖書館出版。）

以上所舉的事實表見中國所謂學者對於達爾文主義的了解至爲可憐，至於一般智識青年更不用說。這也是不足爲奇的。因爲達爾文的著作共二十二種，譯成中文的至今不過兩種（馬君武所譯人類原始及類擇，我曾拿達氏的原本對校過，發見他用文言譯書，頗欠正確，故拙著我的生平所引達氏的話都直接從原文譯出，懂英文的人應讀原文，否則此等書值得重譯，）而馬先生的達爾文傳取材既欠剪裁（如大學生活一章本不重要，多至十八頁，比格爾之旅行一章爲達爾文形成學說的來源，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却不過七頁，）對於他的學說更未提及，介紹的工作僅止於此，叫人們從何處懂起呢？

今年四月十八日是達爾文的五十年忌日，一切有文化的國家都

替他出紀念專冊，而我們的學術界呢，簡直是寂寂無聞！在當時猶可說是被日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炮嚇得頭昏眼花，學者們驚魂未定，無暇及此。但最近半年來，不獨出版界未嘗刊佈過達氏的任何種著作，即各種報章雜誌也沒有登載過一篇關於他的論文。這正是中國學術界之差！我們要希望國人對於達爾文主義有較深刻的認識，應當將達氏的原著和與此有關的著作多多翻譯過來，而一部講達爾文的生平事業與學說的書，尤爲當務之急。海爾博的達爾文傳及其學說一書雖算不得什麼名著，但頗便初學，故特取而譯之，作爲我對於這個有功於世界學術的大學者五十年祭所表示的一種小小的敬禮罷！

海博爾的書既只是一個小冊子，故對於達爾文的學說敘得非常簡畧，而於他的方法論更未置一詞。我以爲方法論是每種主義的根本

問題，要想了解某種主義，當首先知道牠所用的方法，否則不容易有真切的認識。故我在此處特將達爾文學說的性質及其所用的方法提出來說一說。墨爾林（Franz Mehring）說得對：

『達爾文雖不是一個革命家，某些達爾文主義者自己雖已經成爲反動派，然就他的學說的性質講，這是一種革命的學說。』（見墨氏哲學史二五二頁—*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Leipzig, 1931）

蒲列漢諾夫（Georg Plechanow）說得更對：

『當人們在生物學上相信種屬不變時，他們的思想便是玄學式的。法蘭西的唯物論者具有這種見解。甚至於他們雖力求捨棄不顧，總是繼續回到原有的見解上去。現在的生物學